**从政党治理到全面从严治党：使命型政党的治理逻辑[[1]](#footnote-1)**

苟立伟 张荣臣

（中共中央党校 党建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承担着国家层面、人民层面、中华民族层面、人类社会层面等多层面的历史使命。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党必须将自身建设得坚强有力，再加上党存在自我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将一般的政党治理上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就成为一种必要，进而实现自我革命，再通过自我革命推动实现伟大的社会革命，最终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使命型政党的治党逻辑。

**[关键词]**政党治理；全面从严治党；使命型政党；治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9）06-0014-0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这场被称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1]取得了重大成就。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的是治党逻辑的逐步清晰与完善。从思维方式上来讲，十八大之前党的建设体现的是一般的政党治理思维，十八大之后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的是一个政党自我革命的思维，从一般的政党治理到全面从严治党，其逻辑理路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十分明确自身历史使命。当时，作为一个革命党，党本身就是体制外的力量，致力于推翻当时的政治体制并建立起理想中的政治体制，实现政治理想。1949年，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在八大上提出了建立先进工业国[2]的目标。此后，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再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执政目标逐步清晰并不断完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政党。

政党分类标准多种多样。郑永年根据政党所承担责任将政党分为使命型政党和选举型政党两种[3]。使命型政党的产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缔造息息相关，其成立之后，就将缔造、维护、治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选举型政党是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产物，这类政党以参与选举为主要形态，以赢得选举并执政为目标。

在西方的政治学谱系中，长期将政党划分为议会党或选举党、精英党或大众党、全方位党或卡特尔党这样几种相对的类型，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组织形式、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很多政党，它们在具备共同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功能外，中国共产党还发挥着引领国家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等功能，而这是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类型概念所无法涵盖的政党功能。在当今时代，许多欧洲主流政党为了大选，或者成为某些特定群体的利益代言人，或者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者，其政党宗旨难以坚持、飘忽不定。这说明，这些政党已经丧失了整合和表达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

而根据前文对中国共产党的考察，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有强烈的使命感，属于典型的使命型政党，而且党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明晰、具体化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并矢志不渝地为所设定的目标而奋斗。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使命型政党，这从理论基础上解决了很多西方政党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政治解释乏力的问题。

使命型政党旨在“吸引人们归附并信奉其理念”[4]并带领人民实现这种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主动挑起引领民族复兴担子，“转型成为融性质、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于一体的使命型政党”[5]。当前，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政治形态已经十分成熟。

**二、中国共产党多层面的历史使命**

历史使命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历史使命受益客体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国家层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这个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出卖主权。特别是在1919年，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参与巴黎和会，但被英美法等国把持的巴黎和会却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而当时参与谈判的北洋军阀政府代表竟然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最终，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并表现出了十足的韧劲。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局面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主张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6]。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最低纲领方面提出了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目标；在最高纲领方面提出了建立劳农专政、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7]。

新中国成立后，党更是多次提出国家建设层面的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到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升级，体现的是党强烈的使命意识。

第二，人民层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对人民层面的历史任务都进行了具体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的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口号[8]，后来，毛泽东还专门强调过“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9]。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但标志着中国站起来了，而且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提出了关于人民层面的工作评判标准以及人民层面的奋斗目标。其实，回顾历史会发现，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强调党要带领人民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党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党的工作评判标准要以人民的标准为标准，而且党所强调的这些内容都是一以贯之的。这说明在党的价值取向中，人民是一个明确的价值主体向度，这不仅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由唯物史观所决定的。所以，当前党在人民层面的历史使命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1]11。

第三，中华民族层面。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夺取革命成功、争取民族独立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所围绕的大层面的奋斗目标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2]。由此可见，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承担起了实现这个梦想的重任并矢志不渝地为这个梦想而奋斗。所以说，中国梦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层面的投射。

第四，人类社会层面。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最终才能解放全人类，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其实具有全人类的类群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毫无疑问也要承担起这一具有全人类类群意义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历史使命不能排除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诉求。十八大以来，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致力于推进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3] 。这是党在人类社会层面的历史使命的阶段性目标。

**三、将一般的政党治理升级到全面从严治党**

由于使命型政党承担着多层面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历史使命，党必须把自己建设得坚强有力，因此，对使命型政党来说，进行政党治理是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使命型政党，其本身又具备自我革命的可能性。那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治党逻辑就在于：将一般的政党治理上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实现自我革命，进而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最终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党能否完整贯彻这一治党逻辑，其关键环节是能否将一般的政党治理升级到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要体现“全面”“严”“治”这几个指标要求，就要使相关的治党战略举措一方面要能够涉及治党的各个方面、关键领域、全部过程，一方面要能够在各方面严格按照要求与规律有机衔接即互相协调、配合、联系。为此，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革升级。

（一）指导思想

用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武装全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并且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长期发展中，党形成了“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再次解放思想**——**再次统一思想”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既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又可以避免经验主义，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实践力量。从一般的政党治理上升到全面从严治党，其内容是方方面面的，这其中自然包括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考察党成立时的历史状况，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科学历史观基础上、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避免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找到了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条件下随着实践发展继续解放思想的正确的理论发展途径。

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这一思想武装全党。因为这一思想是新时代的科学理论，可以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以这一思想作为指导并武装全党，党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才能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方向，才能保证党最终实现历史使命。

（二）推进主线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使命型政党而言，其使命的艰巨性和连续性决定了党必须长期执政，为此，党必须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从一般的政党治理到全面从严治党，着眼点必须从执政能力建设转向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而政治上先进、组织上纯洁能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保障。在新时代，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继续奋斗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得明确党的建设的主线，并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这条主线就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

（三）总体布局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进行了总体布局，这个总体布局相较于以往党的五大建设的布局，变化较大，这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在于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增加了党的纪律建设，以往单列的制度建设被改为“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往的反腐倡廉建设被改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新时代的新要求，另一方面这是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经验的总结。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工作和重要经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我们党发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或者最终都指向政治方面的问题，联系十八大以前管党治党的经验，党中央认识到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11]61。至于纪律建设，则是党建具体工作的法规保障。而党的建设其它方面的变化则基于党建不是几大建设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方面建设紧密联系、互相配合的一项系统工程。因此，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相比较以前，更加系统、严密，体现出了明显的系统思维，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治理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5]。这个总目标涵盖着一个强大执政党的所有内涵要素，这其中，自我革命是核心要素，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鲜明也最可贵的品质。

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因此政治秩序运行好坏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体系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党内治理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秩序的好坏。政治秩序的好坏又关系到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能否实现，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14]。党作为自身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主导者、推动者，作为阶段性历史任务目标的设定者，党内治理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党自身运行的有效度，进而关系到中国这个政治体系运行的有效度，最终关系到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能否实现。因此，党作为使命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在治理目标的设定上确保党能够始终胜任历史使命。一旦党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有清醒认识的时候，就会自觉地将政党治理升级到全面从严治党，并以此作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体现出了明显的自主性，自觉地拿起了“手术刀”进行自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党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如何设定、工作如何部署等问题的认识都越来越明晰。

从政治逻辑上来讲，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前提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主要是从党内治理给党所带来的变化的剧烈程度而言的，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十八大以来党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给党内带来的变化是剧烈的，对党员思想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对党建理念的变革也是“脱胎换骨”的，真正实现了政党治理的“升级换代”。

**参考文献：**

[1] 杨晓渡.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N].人民日报，2017-11-15（06）.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8.

[3]郑永年.目前全球有两类政党[N].联合早报，[2017-12-03.](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71203-815809,2017年12月3日）)

[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4-135.

[5]唐亚林.使命-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J].南京社会科学，2017,(7):1-7.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 [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1.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9.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5.

[10]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2.

[1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36.

[13]王斯敏,李曾骙,孙小婷等.聆听中国故事 洞见政党使命[N].光明日报,2017-12-04(3).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49.

责任编辑：邓小龙

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18AKS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苟立伟（1987- ），男，陕西咸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支部生活》特约编辑，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研究；张荣臣（1962- ），男，河北海兴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研究。 [↑](#footnote-ref-1)